

Israel Epstein

爱泼斯坦作品集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FROM OPIUM WAR TO LIBERATION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 著 鞠方安 张娟 张清河 / 译

爱泼斯坦作品集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FROM OPIUM WAR TO LIBERATION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 著 鞠方安 张娟 张清河 /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 爱泼斯坦著; 鞠方安, 张娟, 张清河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5.8

(爱泼斯坦作品集)

ISBN 978-7-5133-1861-7

I. ①从… II. ①爱… ②鞠… ③张… ④张…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1840~1949 IV. ①K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0947 号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 鞠方安, 张娟, 张清河译



顾问: 黄浣碧

策划: 孙志鹏

责任编辑: 李珊珊

责任印制: 李珊珊

封面设计: 邵琳琳

版式设计: 魏丹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正文用纸: 瑞典进口全木浆轻型环保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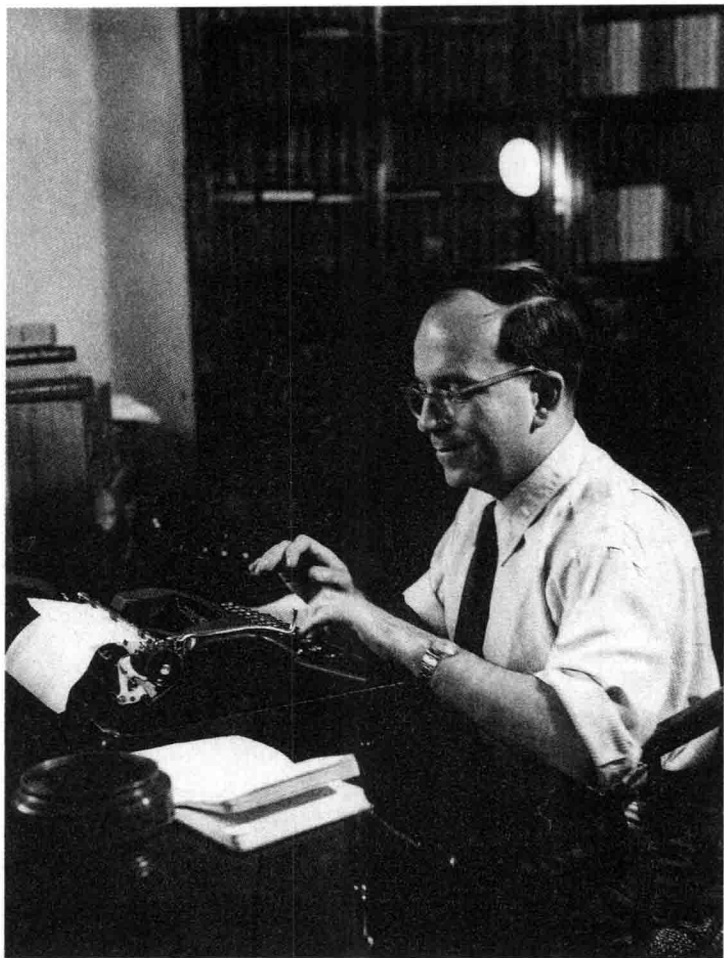
字数: 183千字

版次: 2015年8月第一版 2015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861-7

定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1956年，爱泼斯坦正在撰写《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序^①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1956年在北京第一次出版，1964年的第二版做了扩充和修改。

本书的目的绝不是要对中国在那个重大转换的世纪中的全部历史加以论述。比如，经济和文化，就无力加以论述。要想包含全部内容，那要写一部大型长篇巨著，这事还是留给那些更具有专业知识的作家们去做吧。

这个短篇著作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要帮助受西方教育的读者（不仅是西方本地的，还有各大洲也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从他们所学的或没有学到的历史中，或者从他们的思考习惯中“换位思考”，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将毛泽东明确而尖锐地提出的“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作为思考历史的界限。

所采取的方法是从已知到未知。因此，要引证许多早期的英文记述报道，但是，要将这些记述，在更广泛的框架内加以运用。不但要引证中国方面的，还要引证那些被省略被掩盖了的西方的历史记述。

① [编者注] 这是作者为本书英文版第3版[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80年出版]所作的序。

首先是帝国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中国和其他的受其统治的土地上，还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本身。其次是客观存在的相互支持，这种支持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隐含着的，然而，更为经常的是完全忘记了过去许多民族和人民的斗争，以及中国人民的那些斗争。

准备和写作这本书，也是为了加深对作者本身的教育。作者本人年轻时（是在旧中国一块外国人管理和驻守的飞地上长大的）也是积极地接受那个时代盛行的欧美中心论的教育。直白地说，就是充满了许多侵略和殖民主义有理的自我辩解。但是，随着种种的影响和亲身经历，特别是在20世纪30到40年代作为一名在中国战场上的记者，开始从那种概念中挣脱出来。随后，积极投入到已经了解到的以及尚未了解到的历史事件的背景中去。

当20多年前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时，是为了帮助读者取向一种类似于重新评价的作用，这应该是非常必要的。从那时以后，本书在消除幻觉上起到了作用。然而比书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每个人的世界的大变革。首先就是新中国的进一步的上升。其次是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连锁反应。今天，第三世界人民最基本的运动，成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统治、支配和扩张的最积极、最广泛的力量。他们遭受得太多太久。他们再也不想遭受下去。

在这些巨大变化的影响下，用英语写作的中国历史也改变了，但是还远远不够。再也不那么明目张胆地叫嚷欧洲中心论，那些了解中国的作家和源自于中国资料的著作也不再是例外。可是他们仍然经常偏向帝国主义和旧中国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很多的所谓“北京推论家”仍然认为中国的不幸在于错失了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于是，他们通过某些历史的偶发事件或者不当举措，做出了他们的推论：“要

不然的话”——事情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假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早期西洋化的鼓吹者为清王朝找到了更为充实的基础；“假如”在1927—1949年，美国支持了中国的私人银行、民族工业以及资本主义改革趋势，而不是国民党的半封建主义、官僚垄断的资本主义以及蒋介石；等等。

现在配备了中国文字的装置和电子计算机数据库，这些学者们苦心孤诣地筛选他们的“假如”所需要的证据。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他们都提出大量的趋势和预兆，而事实上，除了泛泛地说些到底为什么的理由外，实际发生的事实却与他们的推论完全相反。

实际发生的结果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采取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此，“北京推论家们”不得不极为勉强地承认了现实。可是他们又暗示：从许多角度上，迟早中国必然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一条长期发展的通道，特别是工业发展——似乎一切都是脱离常规的。他们说作为一种光鲜一时的倾向，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资本形成的模式，在实施这种功能的国家里，大量私人资本聚集不起来，而且注定要蒸发掉。人们觉得那只是一种探索的动机，而且官方和企业如此经常地得到好处，使社会主义的意念消亡得更快。

但是在这个酸葡萄园里，劳动者们从另一方面看到这样的基本事实——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帝国主义阶段已经把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堵死了，使得他们的那些“假如”成为不可能。世界历史的实际动向，使得社会主义道路在我们的时代成为中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证据就是——一百多年里，所有其他选择都归于失败。

尽管这样，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不肯罢休。20世纪70年代，有一段时间公开对老牌殖民帝国主义的行径勉强表示亏欠之后，又开始回

潮。那些新的辩解人问道：它真的是那么糟糕，可是它确实存在过吗？也许，毕竟它的本意是好的，一般地说结果是好的。是愚蠢和盲目（双方）导致本可避免的冲突。

西方的“北京推论家们”的“假如”学派，20世纪60年代在莫斯科有了同行。在那些悲叹中国脱离了“正常道路”的翻版中，就有王明倡导的“正确道路”，然而，长期的历史证明，它不可能导致成功，而只能导致依赖、灾难和投降。

他们有他们自己设置的一些“假如”。如果中国的共产党没有把重点转移到农村去；毛泽东也没有在1935年长征期间，进入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层；如果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没有延安的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际。还有，如果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的是依赖型国家，而不是独立自主的发展，没有建立过人民公社，也没有过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甚至在中国和世界上搞霸权。

克里姆林宫的信徒们对历史的无知不亚于西方，他们也在探寻为什么他们“昨天”失去了中国，而想象是否明天它还能回归，这在1970年代这个不同凡响的时代，不过是一种幻想。资本主义美国的统治者们通过在中国，在朝鲜，在印度支那得到的教训，不再希望导致那些失败的场景重现。但是克里姆林宫新的社会——帝国主义——却将百万大军，陈列于中国边界上，他们继承了老杜勒斯和麦克阿瑟的妄想。

在这两种信仰的正统“北京推论者们”看来，中国所采取的，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导的道路不仅仅是离开了正确的道路，他们还固执地认为，在他们眼前发生的事都是不真实的。然而，的确，已经完成的事业出乎人们的预料，不仅中国的革命成功

了，而且在仅仅三十年的时间里，人民的吃穿都已无虞，而且铺就了坚强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并且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前行。肯定，在这过程中会有困难、错误和挫折。但是，如同1949年之前那个阶段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新的斗争阶段也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很清楚，尽管某些背景还会有改变，这本书的最初的目的——有助于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仍然是必需的，并将长期坚持下去。更为重要的是，使研究过去服务于人民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服务于那些寻求骑在人民背上的人们。任何国家的历史必须从其本国人民的立场上观察，世界历史的背景也必须从全世界人民的立场上去看。

出于这个原因，希望现在这一版会有小小的贡献。由于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来自中国本身真实的政治和历史资料，其中就包括那些可能修改过的词语和本书内的评价用语，对此本书可以起到一种桥梁的作用。对那些为寻求各国人民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真正理解而做出认真的和有益工作的中国海外学生们，本书或许是一个有用的伴侣。

再版此书一个迫切的理由是，有不少学生仍然在寻找老版本（现在已经不再出版）使用，所以急需一种新的版本。多少也是为了更适于当前形势，用一个1966年没有完成的版本为基础，做了修改与扩充。本书如有缺失和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爱泼斯坦

1979年11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旧中国	001
第二章 鸦片、战舰和传教士	009
第三章 太平天国革命	017
第四章 “西学为用”的第一次失败	037
第五章 中国被瓜分的危机	051
第六章 改革者及其失败	059
第七章 民众的义和团起义	063
第八章 走向资产阶级革命	073
第九章 清王朝被推翻了	091
第十章 军阀统治与新人民力量的诞生	095
第十一章 1919年的“五四”运动，新民主革命的开端	113
第十二章 创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走向前	121
第十三章 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	129
第十四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141
第十五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55
第十六章 抗日战争	173
第十七章 解放战争及其胜利	191
作者后记	215

第一章 旧中国

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文化可以追溯几千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涌现出许多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而做出贡献的伟大战士，以及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哲学家、诗人和军事谋略家。中国是第一批将物质文化推进到极高水平的国家之一，娴熟的农业为人口大量繁衍提供了基础，著名的工程科技的发明有纸张、丝绸、火药、航海罗盘、印刷术和陶瓷等。此外，中国先于欧洲几个世纪使用的有：

用煤做燃料。

钻井取盐和天然气（相当于现代的油田技术）。

在冶金时使用鼓风机。

在机械中使用齿轮和发条。

在船只上使用尾舵、水密仓和桨轮。

拱桥，悬浮桥和运河的水闸。

预测地震的地动仪。

算盘，高度准确的圆周率，数学上的二元方程。

在战争中使用弓箭、火炮和用火药发射火箭^①。

中国人开始加工铁要比其他国家晚些。但是，由于他们首先运用了煤，所以在这项重要的技术上迅速领先。第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普林尼（Pliny）写道，在罗马时期，来自于中国的铁是最好的^②。罗马称中国为Serica，意为丝绸之国，这见证了中国和罗马之间贸易的另一种商品——纺织品——的名声。

事实上，中国生产的丝绸领先于西方两千多年。除此之外，中世纪的旅行家们，比如马可波罗，就对使用纸币——这种先进的经济组织的票据——感到惊异。那时其他地方还对此一无所知（虽然马可波罗是一个对钱感兴趣的商人，但是他没有文化，他甚至没有提到这些纸币以及中文书籍是用印刷术印出来的事实，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发明，而那时欧洲对此还闻所未闻。）直到18世纪末，所有到中国的访问者，都异口同声地赞美中国。

但是，欧洲的革命很快证明：在古老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即使已在长时期中确立了技术优势，也会很快被那时的一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追赶上来。中国在2500年里始终处于封建地主的统治之下，很快陷入落后的行列里。西方的专家学者们开始没完没了地唠叨起中国“落后”，甚至认为整个东方社会都是“静态性质”的。

这种概念是不科学的，是沙文主义的，它是专门用来帮助资本主

① 更多的其他发明，见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个精心的调查记录，1954年以来已出版了多集。

② 普林尼（Puliny）：《博物志》（*Historia Naturalis*），第34卷，第41页，第145页。“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伦敦，1958年），李约瑟教授，“5世纪到17世纪，是中国而不是欧洲产出了尽可能多的铸铁并且普遍用相当先进的技术冶钢，而西方对此尚一无所知，”此外，“在中世纪只有中国能够找到丰富的铸铁和钢的供应。”

义帝国主义对亚洲现时代的粗暴侵略，以便推行它们的“文化和进步”。今天，那些害怕东方新革命的人正在兜售一种新版的理论。有一种学派对必将在世界各地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说那根本不是进步，而是一种古老的基于一种“高压式社会”之上的“东方专制主义”^①的轮回（即：源出于由一个专制独裁的中央集权国家广泛控制的灌溉工程概念），像希特勒的种族理论一样并追求相似的目的。这类概念是为了把人类中仅仅一部分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发展形式灌输给人民，而把所有其他的人民贬低为“异己”或险恶的。这是一种很古老的政治手法，好像与历史的发展或其他任何科学无关。它现时代的目的是使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忘记阶级力量问题、进步问题以及每个国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反应（其实，这些命题根本就是全体人类所共有的），使他们成为“他们自己同类”统治者手中的顺服工具，也就是说，他们同类一齐作为压迫者，去反对另外地方的平民百姓。

实际上，和这些概念相反，中国的发展遵循着和其他种种社会大体相同的道路。它的步伐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国家相比，只是有时快一些，有时慢一些。它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氏族部落）演化为奴隶社会，又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不过比欧洲走前了几个世纪。然后，它停滞在了封建社会，所迟滞的时间两倍于欧洲，于是它落后了。

现在，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改变，不必再像西方那些国家那样去背负几百年的资本主义。中国正在以非常快的速度，用革命打倒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控制，去建设一个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

^① 这是“冷战”时期魏特夫（K. A. Wittfogel）的理论，此人是帝国主义宠爱的所谓“中国历史学家”。他的一篇从歪曲马克思开始的论文，用地理的因素取代经济和社会力量作为历史的要求。作为一个背叛者，他驱使麦卡锡主义者对学术界的同事进行政治迫害。

主义强国。从更广泛的社会理念上说，是老旧的资本主义“停滞”了（当然，不是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了封建的阻碍，毕竟它有过几个世纪的技术滞后，何况还有些资本主义的传统和习惯需要克服）。

至于为什么中国的封建主义经历如此之长，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仍然没有最终的回答。但是，下列的原因很值得探讨。

首先，所有的封建社会，不同程度地都有下列特点：

农民自己生产的手工制品，绝大部分是自己使用，没有大规模的商品流通，而这种商品流通足以摧毁当地的自给自足经济。

地主阶级敛聚的大量地租主要是满足他们自己享用和统治的需要，后者包括朝廷的豪华奢侈，大批官员的支出和对外扩张边疆的战争以及镇压内部人民的战争。所有这一切，都阻止了大量的资金投向工业和贸易。

第二，重要的是，一些历史学家所看重的中国封建主义的更加特殊的一些特点：

很早就形成了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中国不像欧洲国家，中央的权力不是通过与城市中新兴资产阶级联盟来获得霸权，而是以皇帝为首由一大批聚集在皇帝周围的官僚，紧紧地把下面为整个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农村组织起来，为以皇帝为首的整个地主阶级的需要服务。这种官僚并不构成单独的统治集团，而“东方社会”特殊论者声称，他们试图把它作为“东方”社会性质“根本区别”的一个证明。它（封建官僚集团）是一个

高度发达的封建主义的工具——是一种东方和西方都会形成的体制，其特点是拥有大量土地的统治阶级通过地租（或贡税）以劳力、产品或货币的形式剥削农民。在中国，城镇是由官员治理的，而防守则属于占优势地位的地主阶级的军队。这样就不会把机会留给新兴的以城市为依托的工商资本家的自治武装。在欧洲如果是这样，地方势力必会起冲突。

中国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否被看作社会秩序的“典型”，还是被看作是“特例”，依赖于对这种难以辨认的制度的观察角度，即，无论是中世纪的欧洲还是旧中国都可以作为标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形势是高度复杂的，其集权的程度是其他任何大国都难于与其相提并论的。这也就促成了这个体系的长寿。

采矿业和制造业这些主要领域，诸如铁、盐甚至丝绸和陶瓷，再如对于茶叶和马匹贸易，早已被地主国家所垄断。在这些领域，商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处于封建政府的许可之下，而这种许可，当局可以随时没收。在这些受控制的工业领域里的工匠们根本不是有工资的工人或者自由的手工艺人，而是农奴。商人的政治地位是低下的，被排除在政府的重要职位之外。所以，一旦他们富有了，他们所关心不是继续经商，而是进入地主统治阶级和它的官僚集团。

在这种方式的组织中，中国的封建社会把商人和高利贷者附属在地主阶级里。三者聚合成一个三位一体的、稳定封闭的剥削集团。因此，就像混凝土，经历许多震动，它仍然保持着完整。中国经历了无

数次的经济危机，以及物质的进步，中国的封建经济和技术并没有冻结和停滞，其科学和发明就是证明。但是，最终，这种精心构筑的上层建筑（政治和思想体系），其基础不可能永固不毁（经济和社会体系），尽管它的基础曾帮助它坚持了那么长的时期。举一个同时代的例子做比较，英国的资产阶级巧妙地与贵族妥协，利用皇室和为工党首相授予伯爵称号，也只能暂时保存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与此相似，美国的资本主义不会靠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游戏而长期存活——两党都牢固地附着在垄断资本上，形成一个各阶层唯一可行的政治活动的通道，为的是使工人感到没有建立自己的政党和政治力量的必要。任何的剥削社会，不论耍什么政治花招，都不可能包含阶级斗争。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完成它的所有的改造任务。

在旧中国，基本的革命阶级是处于地主阶级、商人和高利贷者三重压迫下的农民，他们英勇不停地战斗了多少个世纪，几乎是单独面对这种顽固的反动力量。

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2000多年间有数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其中大的农民起义有17次。他指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世界上是空前的”。他们是“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之所以经历了这么长时期的斗争未能改变社会制度，而只是推倒一个王朝再重新分配土地，其原因在于物质和社会的发展尚未产生出历史的接续者。全部的历史证明，在新阶级出现并壮大之前，农民自己不能单独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社会或国家权力。直到20世纪，终于出现了资产阶级，并强大到足以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夺取政权，然后又征服了农民建立自己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在今天的世界上，年轻的工人阶级可以取代资产阶级去领导农民，使之成为自己的盟友。直接通过反封建的革命，消灭一

切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社会主义，这正是最终在中国发生的。但是，在条件成熟之前，它的农民起义无法超越封建主义。然而在这种冲击下也还是刺激了生产取得一些进步，为最终革命斗争的胜利创造了充足的条件。

当然，资本主义的种子在中国也有所产生，特别在17、18世纪和19世纪初逐渐增长，商品交换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明朝（1368—1644）封建税收和劳役并入单一的货币税收——收取银两。官府命令农民种植棉花，商人们建纺织厂，一个工厂有时多达数百人。外贸也发展到一定程度。在随后的清朝（西方入侵之前），广西有1000名挣工资的矿工，在广东有5万名纺织工人，茶叶加工也建有大的工场，其工人多达5000人，著名的景德镇陶瓷窑发展到精细分工。山西省的钱庄就是一种早期的银行，在很多地方有它们的信贷网，办理汇款和存贷业务，有时它们还充当政府征收赋税的机构。

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这些现象进一步证明了，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阶层的等级序列是一切社会的内在趋势。但是，它们（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成长被迟滞下来，其原因就是我们上面所概述的。所以，最终攻破中国封建社会体系长城的，不是中国而是外国资本主义。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我们还会看到，正是这种原因制约了中国以后的发展。18世纪中期以后，刚刚征服了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了与“中国贸易”的头号获利者。起初，在这项商业活动中，中国是制成品的供应商。中国的出口商品不仅有茶叶，还有丝绸、棉织品（土布）、陶瓷以及其他制成品。作为反向的交流，中国小量进口的主要物品是毛皮、药材和富人餐桌上一些精选的食材。1796年，乾隆皇帝在给英国乔治三世建议增加贸易的回信中说：“我们拥有一切东西，我不认为怪异奇巧的东西有什么价值，你们国家的那些制成品